

融合 与共生

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

卞崇道 | 著

就日本而言，尽管它是一个岛国，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语境和话语方式，打造了独特的文化特色。从纵向的文化史的考察中，我认为日本文化的发展走的是『共存↓融合↓共生』的道路；从横向的文化内容的考察中，我感到日本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理解事物，并且在这个层面上加以展开。东方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迎来了复苏的机遇。东方文化传统本身所展示的仅仅是深厚的根基与复

主增长点，现时代向它提供的只不过是民的共同任务。

人民出版社

融合 与共生

卞崇道 著

——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钟金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卞崇道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7-01-006917-3

I. 融… II. 卞… III. 哲学-研究-日本 IV. B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5385 号

融合与共生

RONGHE YU GONGSHENG

——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

卞崇道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917-3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日本思想文化发展历经千余年,形成了独特的内容与特征。若以哲学思想为主线来看,可以说,明治时代以前为日本哲学思想酿生、展开与成熟的时期;其后为现代日本哲学诞生、成长与结果的时期。前者以中国思想的导入为契机与介质,后者以西方哲学的移植为契机与介质。前者以德川后期创造性思想体系辈出为成熟标志,后者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哲学为鼎盛。日本哲学的特质根植于在日本岛国风土中形成的日本人的自然观、环境观、生死观、伦理观之中。概言之,融合与共生是日本思想文化所呈现的外在的形相与内在的质料相统一的特征。

关于日本文化的上述特征,许多日本学者早有论述。如九鬼周造在《关于日本的性格》(1937年5月26日在第三高等学校的演讲)中说道:“所谓日本文化,有时是指相对于印度和中国文化而言日本固有的东西,有时是指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以东洋全体为背景的日本性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根据现实来思考,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何为日本文化呢?德川时代国民精神的自觉,一方面与佛教中所含的印度文化相对,另一方面与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相对,而采取拥护日本固有文化的形式。……单纯抽象地思考日本文化的人至今仍一味排斥汉学或者汉字,脑中充满着‘大和心’之类的观念。但这不过是被抽象的理念所左右。

今天我们在思考日本文化时,应该认识到日本文化是吸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后浑然融合为一的文化。”^①他又说:“从外在方面看,自然、意气和达观三个要素也可以看做分别与神、儒、佛三教相当,所以从发生的角度来看,也可认为神道的自然主义是质料,儒教的理想主义和佛教的非现实主义则被形式化了。如此,在这里可看出以神、儒、佛三教融合为基础,培养了国民精神,发挥了日本文化的特色。”^②

笔者曾说过:“从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转型既不等于复本民族文化之古,又不等于照搬外域文化;它要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基地,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容外来文化,在融合中实现优化创造;同时又要批判地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继承也是为了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现代文化,以至使全社会进入新的文明境地。”^③之后又说:“我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不是唯一的。西方近代思想是它的一个源头,日本传统思想、特别是江户时代町人的世俗文化,也是其源头,或者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也可以说是它的间接源头。一句话,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也不是东方传统思想的现代翻版,而是东西方文化融合所产生的独特的现代日本的民族精神。”^④在本书中,笔者则明确地提出“共生文化论”的看法:“近十年来,笔者在许多场合提出共生文化论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理

① 《九鬼周造全集》第三卷,第374—375页,岩波书店,1981。

② 同上书,第387页。

③ 卞崇道:《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第17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④ 卞崇道:《日本哲学与现代化》,第30—31页,沈阳出版社,2003。

论或文化哲学,它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民族间文化关系、国家间文化关系,也可以用来考察内部文化发展状况。就日本而言,尽管它是一个岛国,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语境和话语方式,打造了独自的文化特色。从纵向的文化史的考察中,笔者认为日本文化的发展走的是‘共存→融合→共生’的道路;从横向的文化内容的考察中,我感到日本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理解事物,并且在个我的层面上加以展开。”^①

日本思想或者说日本文化的融合与共生的特征,是日本人在长期的岛国风土中形成的。和辻哲郎在其名著《风土》中认为,早自原始社会起,日本人就生活在“不需要个人自觉意识的感情融合共同体”之中^②,这种无意识的“融合”的思维成为日本人处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但是,当我们把“融合与共生”视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时,并非意味着日本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把这个问题的处理得很好,呈现文化融合与共生的繁盛景象。相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日本文化亦曾走过自闭、排外、与彼为敌的道路。这是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日本学研究者不可忽视且不能忽视的问题。

要客观地认识他者,首先要客观地认识自己;自己中包含他者,他者中也包含自己。树立他者意识,站在他者立场,客观地认识、研究日本思想文化,是笔者在本书中试图提示的一种方法论视角。超越中日两国的域界,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来认识日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② 和辻哲郎:《风土》,第131页,商务印书馆,2006。

本或中国的思想文化,则是构建 21 世纪东亚哲学的前提。只要东亚哲学家拓宽视野,共同努力,就能够为建设和谐东亚、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近代日本哲学的东亚意义	(1)
一、近代日本哲学产生的特征	(1)
二、近代日本哲学展开的特征	(6)
三、近代日本哲学的东亚意义	(12)
第一章 传统的解构	(16)
第一节 日本精神的核心	(16)
一、和魂	(16)
二、武士道	(25)
第二节 现代性的萌芽——以安藤昌益与 二宫尊德为例	(30)
一、从安藤昌益到明治哲学	(30)
二、二宫尊德的“一圆融合”论与全球 共生意识	(40)
三、二宫尊德的公共性思想——公共哲学的 视角	(47)
第三节 历史转折期日本儒学的命运	(55)

一、社会转型期儒学面临的冲击与挑战	(55)
二、儒学的复活与变形	(73)
第二章 西学的导入	(97)
第一节 东亚哲学史上的西周——以“哲学”用语的 定译为线索	(97)
一、“哲学”用语的定译是东西思想融合的 产物	(97)
二、“哲学”用语定译的意味	(103)
三、全球化潮流中的“哲学”	(107)
第二节 大西祝的批判主义哲学	(111)
一、批判主义哲学	(111)
二、理想主义伦理学	(118)
三、美学思想	(126)
四、政治社会思想	(134)
第三节 明治哲学现代性的反思	(142)
一、传统思想重构的类型、内容与方法	(143)
二、明治哲学的双重性格——现代性与 前现代性的同在	(149)
三、明治哲学双重性格的后续影响	(154)
第三章 东西方哲学的融合	(163)
第一节 东西方哲学融合的独特性——西田哲学的 宗教性格	(165)
一、明治宗教哲学与西田几多郎	(166)
二、西田宗教哲学思想概观	(171)
三、西田宗教哲学的特性	(181)

第二节 东西方哲学融合的独特性——九鬼周造的偶然性哲学	(187)
一、《“审美意识”的结构》	(188)
二、偶然性哲学	(191)
三、九鬼周造哲学的意义	(198)
第三节 东西方哲学融合中的歧途——世界史学派的历史理论	(200)
一、高坂正显的《世界史观的类型》	(202)
二、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哲学》	(208)
三、西谷启治的《世界史的哲学》	(211)
四、对京都学派中世界史学派的历史哲学的评析	(214)
第四章 多元文化的共生	(217)
第一节 海洋文化产业的哲学解读	(217)
一、有限与无限的海洋世界	(218)
二、文化的动态理解与文化产业	(220)
三、海洋文化产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23)
第二节 关于岛国日本文化论的思考	(229)
一、“杂种文化论”	(229)
二、“平行进化论”	(233)
三、“共生文化论”	(238)
第三节 21 世纪中日文化的共生	(242)
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日社会发展落差与文化关系的颠倒	(242)
二、师事日本的文化诉求	(244)

三、从中断到对等文化关系的形成	(246)
四、相互理解的文化桥梁	(248)
五、为创建共生文化而努力	(251)
第五章 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	(256)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历史轨迹与特征	(256)
一、东方文化的界定	(256)
二、东方文化的历史轨迹	(257)
三、东方文化的基本特征	(263)
四、中国与东方诸国的文化交流	(270)
第二节 东方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275)
一、宗教信仰多元多样	(276)
二、哲学传统源远流长	(281)
三、文艺理论精品纷呈	(285)
四、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丰富多彩	(289)
五、和谐发展的人学观	(294)
第三节 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	(298)
一、重构现代东方哲学的必要性	(299)
二、在东西思想融合与共生中重构东方哲学	(307)
附 录	(312)
一、访谈:东方文化与 21 世纪	(312)
二、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哲学对话	(315)
三、探索日本现代意识的哲学家——竹内良知	(325)
参考文献	(357)
后 记	(362)

绪 论 近代日本哲学的东亚意义

在东亚近代史上,日本谱写了自身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在 19 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保持了对自身及世界形势的清醒认识,并通过明治维新这一自身改革运动达到自强,从而不仅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而且以此为契机,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经由文明开化、殖产兴业而至国富兵强时,便与西方列强为伍,参与抢占和瓜分亚洲殖民地,以致走上侵略中国等周边国家的道路,既给受害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也给自身造成惨重损失。在东亚近代史的实践运动中,日本所体现出来的双重性格,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人民带来深刻的启示,极具现实意义。

那么,支配近代日本人上述行为的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是什么呢?近代日本的哲学思想,对于东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里,笔者仅以明治哲学为中心,从东亚的视域就近代日本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略陈己见。

一、近代日本哲学产生的特征

日本有没有哲学?假如日本有哲学,它始于何时,又是如何产生的?在今天看来,这也许是些不言自明的问题,但若加以认真地追溯和研究,这些又是不无意义的问题。

1. 日本前近代哲学基础薄弱。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笔者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诚如所知,中江兆民(1847—1901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们日本没有哲学”。^①对于这句话的解读,永田广志在《日本哲学思想史》绪论中作过比较正确的解说^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者中,也一度引起过争论。笔者认为,中江兆民的这句名言指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是指出了在Philosophy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的哲学基础薄弱这一事实。因为在西周把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1874年)之前,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有“哲学”这一门科学,更谈不到了解它的内容。那么,从古代,经中世到近世,日本人有没有自己的思想生活乃至哲学思维呢?回答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德川时代,日本人充满思想活力,创造出许多有见地的理论成果,其中包含有对人生与自然的深刻的哲学思考。但是,与西方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等历代思想大师专事哲学活动,建构了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哲学相比较,可以说,前近代日本还没有形成纯粹的哲学。换言之,在西方“哲学”传入日本时,日本并无接受它的充分准备。其二是指出了明治初期尚未出现成体系的日本哲学这一事实。自西周、津田真道等人留学西欧归国后,在全面导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把Philosophy移入日本,从此日本人才得知“哲学”的含义。到井上哲次郎赴德国专门学习哲学归来,在东京大学开设哲学讲座,日本开始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设立并讲授,标志着日本哲学研究的肇始。

①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79。

② 参见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9—14页,商务印书馆,1978。

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中江兆民生活的明治前期日本虽说有了哲学活动,出现了如西周、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刊发了许多哲学论文,但归根到底他们还不是专门的哲学家,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西方哲学介绍到日本,进行哲学启蒙活动。尽管有的人也开始建构哲学体系的尝试,但并未创建出真正的体系性的哲学。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此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哲学,充其量只能说有了自己的哲学研究。

2. 以移植西方哲学为契机形成了近代日本哲学。上述中江兆民的名言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近代日本哲学^①形成时期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以移植西方哲学为契机的。这种契机大体始于幕末的西学研究。

我们知道,西学东渐日本,并非始于明治维新。早自16世纪中叶起,基督教文化就已传播到日本。那时,传教士办的神学校

① 关于近代或现代日本哲学的分期问题,学界并无定说。日本史学界一般使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战后来区分日本历史,而很少使用“现代”一词。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则多使用古代、近代、现代的三分法来区分日本历史时期。关于日本哲学史如何分期,由于日本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在西方哲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有思想而无哲学,因此也就少有人写日本哲学通史,仅有的几本日本哲学史著作冠名各异,如有麻生义辉的《近世日本哲学史》(内容为幕末至明治初期),有宫川透、荒川几男的《日本近代哲学史》(内容为幕末至1945年日本战败),也有把幕末起西方哲学移入后的日本哲学称为“现代日本哲学”的著作。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者多依据史学分期把明治时代以前统称为“古代日本哲学”,把明治时期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称为“近代日本哲学”,之后的则为“现代日本哲学”。笔者也曾如此分期。但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之后,笔者感到日本哲学史的分期一方面要考虑日本历史演进的实际,另一方面更要考虑日本哲学本身产生、展开的实际,即更要重视依据日本哲学的内容来分期。笔者的提议是,从幕末移植西方哲学开始到明治时期为日本近代哲学,从大正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从西田几多郎出版《善的研究》(1911年)开始为日本现代哲学。

曾讲授过宗教哲学,然而旋即被禁。至“享保改革”(1716年)年间,德川幕府为挽救和加强幕藩体制,开始导入西学,时称“兰学”或“蛮学”,意指欧洲诸科学以及对于欧洲情况的研究,内容涉及医学、历学、天文学、本草学、兵学等各个领域。但是,当时导入的西学被严格地限定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于西学的这种接受方式,给予日本的学术以决定性的影响。西学先驱者新井白石(1657—1725)在其所著《西洋纪闻》中认为,西学只是作为“形而下之物”,才可谓为精湛之学问,不承认西学是“形而上”的学问。换言之,白石只认为西学在物理的、实理的方面是优秀的,而在精神的、道义的方面则毫无可取之处。白石的这种西学观对后世影响颇深。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思想,桥本左内(1834—1859)的“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的主张,无不源于白石。时至幕末,西学已由知识界扩大到庶民阶层,同时培植了批判幕藩体制的根芽。以渡边华山(1793—1841)、高野长英(1804—1850)为首的“尚齿会”遭到幕府镇压(史称“蛮社之狱”),就是典型。华山认为,日本不仅要学习欧美近代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且也要重视欧美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发展,它们的原动力均在于物理之学。这样,华山把物理学的精神不是仅仅限定在自然科学及科学技术领域,而且也视其为贯穿于社会科学或社会制度、教育制度领域的精神支柱。可见他的见解已经突破了白石以来的把西方文明局限于物质文明、把东亚文化置于精神文化优位的西学接受方式。高野长英是导入西方哲学的先驱者。他在描述自然科学史的著作《闻见漫录》(1835—1836)中,辟有“西洋学术之部”一章。在此章,他简述了起自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哲学,并且论及哥白尼和

伽利略。他把笛卡尔看做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评价说:“弃世人千古之学风,入实学之真理,乃此人之功也。”进而在言及培根之后,认为牛顿、莱布尼茨、洛克三人是使近代“实学之真理”彻底化,确立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家。^①不难看出,长英作为致力于移植近代医学的一名医学家,他是从作为近代医学基础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观点上叙述西方哲学史的。此外,在这篇短论中,长英比明治启蒙思想家西周率先一步,也为哲学用语的翻译煞费了苦心。上述西学观念的变革,为明治伊始全面移植西方哲学铺平了道路。

3. 理解西方哲学的视角。在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政策引导下,西方思想与文化全面涌入日本,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亦被正式导入日本。在向日本介绍西方哲学,进行哲学启蒙的活动中,日本思想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自己如何理解哲学的问题。在这里,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理解西方哲学的儒学视角。

这里我们仅以明治初期思想家西周为例略加说明。西周(1829—1897)出生于德川时代末期,明治维新前是他接受教育、探索真知的思想成长期。从思想源流的视角看,他的思想成长过程可以描述为:儒学→洋学。西周祖辈世代行医,且保持儒学的家学传统,特别是祖父时雍对儒学尤有研究。直到20岁,西周接触的都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此间,他偶得获生徂徕的《论语征》,深受启发而关注徂徕学。1849年(20岁)是西周学习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获准游学大阪。1853年,美国使节佩里叩关,朝野震惊,西周到江户。这一年冬天,西周始学荷兰文,1856

^① 参见宫川透、荒川几男:《日本近代哲学史》,第12—13页,有斐阁,1976。

年继而学习英文,并入“蕃书调所”^①任教。在此,他广泛阅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著作,视野由东方转向西方,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变化。1862年至1865年,西周留学荷兰,在莱顿大学师事法学博士维塞林,接受其实证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归国后升任“开成所”教授。

明治维新后,西周作为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受聘于新政府任要职,并且作为启蒙家的学术结社“明六社”的主要成员,展开了积极的理论活动,成为建构明治思想的巨擘。在理论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以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批判东亚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学;而他批判儒学,又不是为了否定和抛弃儒学,而是以西学改造儒学,使之转变为新时代的学问。

作为明治初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首领,西周在接触、理解、移植西方哲学时的态度与做法,表明他既想超越日本乃至东亚思想,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其束缚。其实,不仅西周这样,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此,这也正是日本近代哲学形成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近代日本哲学展开的特征

以移植西方哲学为契机而形成近代日本哲学,主要是就其形式而言的,这种特点也影响到其后近现代日本哲学的发展。日本哲学史家船山信一认为:“日本近代哲学发展形式具有下述特殊性:西方哲学的发展($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 \rightarrow E$)和日本哲学的发展($A' \rightarrow$

^① 幕府于1855年设立江户洋学所,1856年改称蕃书调所,成为幕府下属的西学教育、研究机构。